

从物质到社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三阶段演变及其内在逻辑

朱富强

(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 广州 510275)

摘要: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在于提高国民和社会的福利,这不仅包含物质福利,也包含社会福利;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的福利内涵是不同的,这导致了经济学的演变。事实上,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将研究对象集中在稀缺性资源的配置上,但这却不是经济学过去也不会是未来研究的主要领域。从经济学说的发展史来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三次重大变更:一是整个古典主义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集中于物质财富创造的探究;二是边际革命以后,新古典经济学集中于资源配置和货币交换的研究;三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经济学日益关注更为广泛的社会效用,从而导致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大大拓宽。

关键词:财富创造;资源配置;货币交换;社会效用

中图分类号:F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6)01-0079-10

From Material to Society: The Three-stage Evolution of Economics Subject and Its Inherent Logic

Zhu Fu-qiang

(Lingnan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purpose of economic research is to improve national and social welfare. It contains not only material welfare, but also social benefits. Also, the welfare connotation changed at different times in history. Those changes lead to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s. In fact, although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still concentrate the subject of study on placement of scarce resources, the focus of research in economics will not be the issue of wealth distribution. The subject of economic study has experienced three significant changes. The first one, holding by Classical Economics is the focus on material welfare creation. The second one, highly emphasized by Neoclassical Economics, is the notion that includes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money exchange. The last one, promoted by mod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after the 1970s, broadens the research content greatly due to referring to extensive social utility.

Key words: wealth creation;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money exchange; social utility

收稿日期:2015-11-06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制度分析的方法论比较及其实践效应”(GD12CLJ02)

作者简介:朱富强,男,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暨转型与开放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理论经济学、经济学方法论和比较制度研究。

一、引言

从本体论的角度,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目的在于提高国民经济和社会福利,尤其是提高低收入阶层的福利或生活水平。相应地,要实现这一目的,就要解决两大问题:(1)在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如何最大化使用的问题,即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2)在使用效率既定的情况下如何增加财富或资源的问题,即古典经济学关心的国民财富的增长问题。^[1]这意味着,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物质财富问题,而且要研究社会关系问题;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就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两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的,共同构建了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2]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却仅仅将其研究对象确立为稀缺性的(自然)资源配置,而随着博弈论以及激励理论的出现,现代主流经济学又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研究理性的人如何行为的学科。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转变呢?究其原因,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需求是不同的,实现福利增进的途径也不同,从而导致了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演变。

事实上,尽管新古典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稀缺性资源的配置上,但从经济学说发展史来看,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本身并不总是经济学的核心,它的确立是经济学经过多次演变而形成的特定阶段的产物。特别是,随着生产要素的拓宽以及人类需求的提升,资源配置问题已经不再是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从而导致对经济学理解的变化。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如何演变的呢?

贝克尔曾指出,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局限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的传统市场学;(2)扩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现象的货币交换关系;(3)囊括人类全部行为的经济帝国主义。^[3]不过,贝克尔的看法还是存在明显的偏颇:(1)尽管早期社会关注的主要是物质生产甚至是自给自足的物质生产,但早期经济学是从事于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关注的是组织的治理规范和公共领域的问题,如从古希腊直到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都广泛地探讨了收入分配、公平价格以及其他应得权利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现代经济学中却被忽视了。(2)由于早期经济学关注的是组织和公共领域的问题,因而它采取的研究方法和得出的相应理论都是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支真正地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从亚里士多德、休谟直到斯密、马克思、穆勒等都是出身于道德哲学领域,而现代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分支之间呈现出割裂状态。^①

在某种意义上说,早期经济学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更为广泛。例如,奥尔森就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认为与经济学家相关的事物范围十分狭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针对当代经济学的。”^[4]³³⁵ 奥尔森也指出,古典经济学的内容非常广,只是从马歇尔到1960年代前后,经济学的题目范围才进一步狭窄化,但是现在题目范围正在拓宽。^[4]²³⁹ 事实上,早期古典经济学家洛克、休谟、斯密、马尔萨斯、西斯蒙第、穆勒父子以及马克思等都首先是社会哲学学家,然后才是经济学家。相应地,他们把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来对待,将人的需求问题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例如,休谟就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位开辟道路将经济学作为更广泛的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建立起来的学者,他打算构建一个社会科学,一种“关于人的科学”,而这个人是在“经验与观察”基础上的道德代理人和社会成员。

然而,在推动边际革命的主要经济学家中,除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外,大多是工程师和数学家,如早期孔迪亚克、古诺、杜普伊特等就是工程师,他们关注个人需求、消费者福利、桥梁运河等公共物品的建设等问题以及固定与可变运营成本、投资收益和市场活动布局等与厂商相关的问题。此后的戈森、杰文斯、瓦尔拉斯、埃几沃斯、费雪等也都可算是数学家,如杰文斯早期接受的教育就是技术方面的,包括数学、生物学、化学和冶金,尤其是化学,只是到了发表《纯逻辑》和《煤炭问题》之后才开始将兴

^①即使就贝克尔推动的经济帝国主义而言,这也主要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向社会学科其他分支的单方面扩张,而不是真正的思维和知识的契合。

趣转到纯逻辑和经济学之间。正因如此,边际革命以降的经济学家开始把经济学视为一个基于效率的逻辑问题,从而忽视了对人之真正需求的关心,从而更是把物质问题视为经济分析必然且惟一的对象;同时,还将研究重心放在讨论经济量的变化上,乃至把商品之间的交换关系也转化为基于货币的价格关系。

当然,不管如何,由于当时物质财富的极度稀缺,人类的需求还主要停留在物质方面,这就塑造了古典经济学注重物质领域的基本特质。同时,自斯密确立了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完全地位不久,那些获得大学首批讲席的经济学家如萨伊、马尔萨斯、西尼尔等就把经济学视为研究物质生产规律的“纯理论”科学,这又促进了边际效用主义的兴起以及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显然,从学术大历史角度看,贝克尔的三阶段论反映了经济学发展的总体历程,尤其凸显出新古典经济学以来的经济学发展轨迹,并蕴含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和拓展范围。究其原因,经济学根本上涉及的是与人类需求相关的现象,而人类需求首先是从物质领域开始而不断上升的,物质需求的上升又引起了交换的需求和货币的出现,最后上升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需求。为此,在贝克尔的三阶段框架基础上,本文尝试系统梳理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演变轨迹及其内在逻辑。

二、注重物质财富增长阶段

西方社会的经济分析往往被追溯到古希腊,当时一群智者已经对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问题展开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他们的见解被马克思称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5]250}当然,当时所谓的经济仅是指管理家庭的实际智慧,直到亚里士多德提出“Chrematistics”后,才有了与现代经济学比较接近的含义,并主要指商业活动的金钱方面。而且,由于古希腊时期的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是不可分的,学者们往往把经济推理与其一般哲学思想揉合在一起,而很少集中研究专门的经济课题;相应地,经济分析也往往只是解释一些经济现象,而没有系统的经济理论。例如,亚里士多德的大量著作中就只有一小部分与经济问题有关,主要探讨了社会的经济组织、财产国有还是自有以及价值与交换等问题,并主要散落在《尼各马科伦理学》和《政治学》两书中。熊彼特写道:亚里士多德“主要的工作以及他主要的兴趣,就社会现象而言,都在我们称之为经济社会学或者毋宁说是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之内,而他将经济社会学与技术意义上的经济学都隶属于政治社会学之下。他所著的《政治学》应该作为他针对国家与社会的一篇论文或教科书来加以评价。他的《尼各马科伦理学》——这是从规范角度对人类行为全面论述的一篇著作——也是如此偏重于对政治人、城邦中的人的讨论,以致我们必须视其为《政治学》的姊妹篇。这两本书在一起,构成了对统一的社会科学最早的系统论述。”^{[6]93}熊彼特甚至认为,在霍布斯的时代之前,所有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的东西都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摄取营养的。

同时,受制于当时的生活水平,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希腊思想家在论述经济问题时,都主要探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交换。例如,首先使用“经济”一词的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通篇就在阐述财富及其增长问题,研究奴隶主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如何有效地压榨奴隶的剩余产品以获得更多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他当时把财富看作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认为“凡是有利的东西都是财富,而有害的东西就不是财富。”^{[7]3}同样,亚里士多德则继承和发展了色诺芬以家庭管理学形式出现的经济学,并同色诺芬一样把财富看作是对家庭和对国家有用的东西,把获取有用物看作是经济学的主题,并在如何获取财富问题上扩大了经济学的范围。

经济学逐渐从社会科学中分立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在重商主义时期。当时,随着新教伦理的革命以及民族国家的兴起,封建主义社会结构迅速衰败,资本主义则蓬勃兴起,商业和赚钱也不再备受轻蔑。相反,如何壮大一国的财富成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基本政策导向。相应地,集中研究经济问题的文章和小册子也如雨后春笋,字词“政治经济学时代”开始取代了“道德哲学时代”。基于中世纪末期

的社会形势,在工业还没有取得实质发展的情况下,新兴民族国家的政策目标就是:通过壮大国家的力量攫取和控制殖民地、主导贸易规则、取得对敌战争的胜利,并在国际贸易中获取金银。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批集中于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学者,产生了如何壮大国家财富的重商主义思想。此时,经济学突然从传统的道德哲学中解脱出来而集中于世俗的贸易和货币流通问题,体现为金银的财富成为讨论的中心议题,有关经济问题的分析就似乎突然跳越到贝克尔所讲的第二阶段。

不过,这有两点值得注意。(1)由于重商主义者主要是由一群从事实践的商人所构成,他们没有理论,更没有系统的经济分析,而主要依靠经验而集中在政策的制定上;而且,当时主要是把货币视为实质财富的惟一形态,把货币积累视为政策的目的,而对货币交换关系的研究还处于相当狭隘和较低的层次上,没有考察货币经济关系。(2)重商主义者根本上是从整个国家的角度来阐述经济问题,当时提出的“政治经济学”名称也是指研究整个国家的经济管理和财富增长;而且,以后很长一段时期经济学研究还是主要集中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面,只不过对物质财富的理解逐渐发生了变化。因此,从根本上说,当时的经济学分析主要还是限于研究物质资料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即贝克尔所讲的第一阶段所研究的内容。

实际上,在古典主义时期之前,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分支并没有截然分开,经济学仅仅是道德哲学或者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当时的学者除了探讨经济问题外,还广泛地涉及政治、社会、伦理、哲学等问题。只是在工业革命后,随着物质文明的膨胀以及学科的分化,经济学科才开始真正地独立出来而成为一门专门学科。究其原因,新兴民族国家为进行金银争夺而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同时也引发了生产的日益凋敝,特别是,当新大陆、殖民地的金银已经被耗竭之时,国内社会矛盾就开始爆发出来。为此,配第、布阿吉尔贝尔、坎铁隆、魁奈、劳等人相继将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从而导致了法国重农主义和英国古典主义的兴起和发展。

其中,首先出现的是法国重农主义,这是对重商主义片面关注货币而忽视物质的否定。究其原因,重商主义在法国造成的社会矛盾更尖锐,原先具有优势的农业也凋敝得更严重。随后出现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它是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综合和扬弃,并真正引导了经济学的发展方向。究其原因,当时英国依靠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为其工商业发展保驾护航,从而积累了巨额的可用于扩大再生产投资的原始金银资本。正是依靠这些原始资本,英国的许多商人都变成了产业资本家,以前分离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日渐统一,流通过程成为再生产的一个环节。显然,在以工业生产为基础进行竞争的新情势下,资本家迫切关心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以提高竞争力,为此,一群学者开始更广泛地思考经济的实质。同时,其他相继独立的社会科学各分支学科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这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思维,从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发展。

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从斯密开始的。《国富论》一书成为经济学科发展的分水岭,也奠定了今后经济学研究的基石,斯密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之父”。当然,尽管斯密的《国富论》往往被称为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革命(对重商主义的革命),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原创性学说,而更主要是对其前辈和同辈的思想综合和诠释。例如,劳动价值论可以追溯到配第和一些经院学者,“分工”一词是哈奇森杜撰并在色诺芬那儿已经被广泛理解,生产性劳动的区分可以追溯到杜尔阁,自发秩序则体现在孟德维尔和坎铁隆的著作中。同样,正是基于人性论和历史理论的结合,斯密对经济生活做了冷静的观察,分析了农业、制造业和商业活动的特征。不过,尽管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几乎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各领域,并且基于连续性原则而继承了重商主义关注货币分析的思想,但总体而言,古典经济学对货币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它对价格而非对产出的影响。

其实,在从重商主义到古典主义的过渡期间,针对货币的研究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是强调货币对产出和就业影响的“货币刺激交换”派,二是关注货币和价格间关系的货币数量论。显然,受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古典经济学相信人的理性以及社会内在的和谐,从而主要承继和发展了货币数量论的研

究路径。也正是基于这一思维路径,萨伊定律认为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在当时,除劳德代尔、西斯蒙第、马尔萨斯以及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学者以外,萨伊定律为当时几乎所有古典经济学家所普遍接受,它也是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政策的理论基础。例如,李嘉图就赞同萨伊的观点,认为生产总是为了消费,人们不可能总是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从而就不存在卖不出去的问题;相应地,即使可能有个别商品的生产过剩,但也不可能产生全面过剩的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尽管斯密开创的古典经济学涉及到了众多的社会科学领域,货币问题也已经成为经济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但流行的货币面纱论使得古典经济学家很少去探究货币对真实经济的影响,也就难以揭示货币经济中蕴藏的危机问题。从这点上看,整个古典经济学时期的经济理论研究主要还是局限于实物之间的关系领域。

同时,尽管经济学之父斯密涉猎广泛,并基于其渊博知识而对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人类行为观察细微,但是,后来学者的知识含量就差得多了,以致他们逐渐将经济学研究内容内缩于物质财富的这一层次。而且,尽管斯密往往偏好于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进行分析、解释,把演绎法、归纳法等充分融合在一起对经济规律进行探究,但是,知识日益狭隘的后继者们却不断强化了一种抽象化的演绎分析,在一些基本的假设前提之下纯理论的推导。例如,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李嘉图就是如此。事实上,尽管李嘉图出身于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但其基本上没有受过历史或哲学的训练,也正是由于“李嘉图意识到他自己并不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道德哲学家,因此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斯密的著作中他有理由表示异议的那些段落上。”^{[8]60}

再如,萨伊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也只是一个务实的工商业家。事实上,尽管萨伊享有掌握第一手知识的便利,却往往只是从报纸上了解工商业的知识分子,并每每以自己的超然地位而自庆;因此,他的著作显得较为浅薄,仅仅是因为文笔上的平易流畅而广受欢迎。熊彼特写道:“它似乎可以为性急和基础不好的读者省去死啃《国富论》的麻烦。这实际上是李嘉图派的意见,他们由于从他那里接受了‘市场法则’而有一些尊敬他。”^{[9]197}相应地,马克思常常称之为“乏味的”萨伊。同样,诸如西尼尔等也是如此。尽管西尼尔本人曾在几个重要的皇家委员会中工作过,而且他在这些委员会中曾从事数量颇为可观的事实调查工作;但是,他却往往得出荒谬的结论,他那脱离实际的主张也往往引起后人的嘲笑。熊彼特认为,西尼尔是能干的,但是打瞌睡的时候太多了,也即蠢话说得太多了。正是因为知识的贫乏,李嘉图往往倾向于基于较少的原理而获得广泛的结论;萨伊则是法国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庸俗化的第一人,并且是各国庸俗经济学的奠基人,而西尼尔则是纯理论的倡导者。

可见,总体上看,古典主义经济学主要集中在传统市场学领域,研究的是实物经济。事实上,由于后来经济学者的知识越来越狭隘,因而诸如李嘉图、萨伊、西尼尔、巴西夏以及他们的信徒和后继者们都致力于财富的研究。当然,由于社会的发展使得人类需求的层次和领域不断扩大,萨伊、西尼尔、巴西夏和穆勒等所理解的财富外延要比斯密所定义的要更为广泛。首先,萨伊指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有关财富的规律,其任务在于确定有关财富如何生产、分配和消费的一般原则,至于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就不属于这个范围。同时,萨伊认为,政治经济学要摆脱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的影响,而专注于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纯理论”科学,从而努力使政治经济学具有纯粹实证的性质,并成为近代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首创者。其次,如萨伊一样,西尼尔也积极倡导纯理论研究;他不仅把政治经济学视为“是论述自然、生产和财富分配的科学”而不是有关福利问题的讨论,而且还在方法论上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进行逻辑推理而不是调查取证的学科,主张从一些公认的前提出发来确立一些基本原则,并围绕这些原则形成一个纯科学的结构。最后,即使具有广博知识素养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约翰·穆勒,在社会科学日益分化的大背景下也认为,经济学基本上是一门抽象的科学,是以假说性的无须以事实为基础的假定为基础得出一般化的结论;并且,尽管穆勒承认购买和销售的分离可能会产生一般过度的状况,但还是坚持所有商品的过度供给总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并会继之以旺盛的需求,因而否定需求滞后供给的可能。

三、转向货币交换关系阶段

尽管古典经济学还是主要集中于物质财富的研究,但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是社会科学出身,他们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广泛。与此不同,此前或此后的经济学家却主要出身于自然科学领域,因而研究领域和研究思维更为狭隘。事实上,古典主义之前的霍布斯、配第、洛克、魁奈等人都是将自然科学的观点及预见引入到经济学当中,他们的第一兴趣都在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物学等相关科学。例如,配第就曾帮助建立了旨在改善自然科学知识的皇家学会,而皇家学会的日常工作是沿袭培根的科学方法——运用观察和试验来研究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为此,配第将皇家学会的自然主义研究方法应用于经济现象,结果诞生了政治算术。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是先学习哲学、法律等社会科学知识,后来才转向经济问题的研究,从而关心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没有完全脱离社会关系的考虑。事实上,即使专注于抽象研究的李嘉图,当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冲突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时,也集中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对立关系,将财富分配作为研究的中心议题。同样,推崇所谓“纯理论”的西尼尔也强调,由于一事物含有多种决定因素,而经济学只是其中之一,因而不能把政治经济学原理当作“实际行动的唯一的甚至主要的指针”。古典经济学研究之广泛在约翰·穆勒身上得到充分的体现。约翰·穆勒具有非常渊博的知识,从而不是纯粹地强调产量增长和效率提高的经济检验,而是重视更具综合性的标准,如包括生活质量和个人的充分发展。实际上,穆勒充满了社会哲学家的关怀,其著作的全名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其副标题就暗示了更为宽泛的目标。

正是基于对贫困问题的关心,穆勒继承和发展了李嘉图重视分配的思想,强调分配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认为分配取决于社会的习惯和法律,政府和不能规定各种分配制度的作用,但有权选择哪种分配制度。同时,穆勒还区别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认为经济学是一门道德科学,关注心灵和头脑中的法则,而自然科学则研究物质的法则。此外,穆勒还表达了这样的信念:经过一段时间,依附性劳动的组织连同其工资制度将让位于新的社会安排,比如利润分享、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合伙制以及特别的合作制等;并且,他认为合作类型的组织有能力捍卫规模经济,并且有能力通过新的激励在规模经济中加入对生产力的促进,这种新激励来自合作的协调精神的影响。然而,由于正处于古典经济学衰落以及各种相互对抗的新思想滋生之时,因而穆勒的理论也很快遭到多方面的批判。同时,由于穆勒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智力训练,以致他轻视智力兴趣之外的一切兴趣,这导致了他最终倾向于对物质财富的抽象分析。

事实上,自洛克和休谟开始,功利主义哲学就在西方社会流行并引进了经济学。譬如,斯密基本上接受了当时事实上流行的行为功利主义思想,而且,正是由于斯密的努力,此后以财富为研究对象的主流经济学既不是从家庭管理着手,也不是从整个国家角度考虑,而完全是建筑在利己主义的经济人基础上,转而分析个体的经济行为。当然,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国民财富的增长,市场的扩展必然导致供求之间的脱节,这一点已经被古典时期的经济学家劳德代尔、马尔萨斯、西斯蒙第以及马克思等人注意到了。正因如此,货币在经济中的作用被逐渐凸显出来,而对货币的关注必然导致对价格的重视,以致除了马克思主义学派之外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逐渐淡化了对价值的研究。其实,尽管后来还有学者常常提到价值,但他们所理解的价值内涵已经与早先的价值完全不同了。例如,熊彼特曾指出,尽管马克思和穆勒都使用“价值”一词,但两者所理解的价值是根本不同的,因为穆勒把价值视为任何两种商品或服务之间的交换比率,并认为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这种交换比率或价格关系。

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科学哲学的兴起,使得微积分、回归分析以及均衡概念

等大量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中;这些复杂的技术日益代替了以前那种简单的技术,从而使得经济学日益成为一种专门的、为一般读者所不易懂得的学问。此时,研究范围的扩展与工作质量的提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探究诸如社会自身的性质问题的作者以及追寻诸如社会结构的因素是什么或发生革命的原因是什么这一类问题的学者,与研究诸如货币、利息、就业之类问题的学者越来越分道扬镳了。这意味着从今以后,经济学和其他学科越来越分离了,这就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主张边际效用的学者继承了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传统,但抛弃了劳动价值理论而代之以效用价值说;开始把欲望最大化作为主要的心理活动从多种多样的心理活动中抽象出来,从人对物的主观评价的效用中发展物的价值和价格。也即,边际效用学派避开对经济现象内在本质的探讨,采用了功利主义思维而集中于问题解决的手段分析;相应地,它抛弃了从价值分析财富的思路,而以货币所体现的效用来分析财富,并建立了以价格调节经济为中心的微观经济学体系,从此经济学就正式发展到贝克尔所讲的第二阶段。

承袭边际革命思潮,新古典经济学以商品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形成了以均衡价格论为中心的微观经济理论体系。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尽管不同学者对价值的决定和价值源泉的看法是不同的,但大多数学人都把价值决定看作是一个客观的社会过程。但边际革命之后,价值决定被看作是个人的消费过程,价值被认为是决定于边际效用,因而财富的概念也被大大拓宽了。事实上,早期经济学之所以得以独立,主要是它把财富从其他社会问题中独立出来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随着对财富认识的深化以及财富概念的拓宽,此时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广泛认识到非物质财富的存在。当然,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学科界限的划分,主流学者依旧把经济学的分析集中在物质福利领域。例如,在以坎南和马歇尔为代表的英美新古典经济学家中,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就是物质福利,在日常语言中,“经济”这个词的一个含义无疑也等于“物质”一词。马歇尔就写道,经济学“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利、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10][34]}相应地,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就试图否认对物质福利以外的人类事物进行经济分析。例如,坎南就认为,战争政治经济学这样的名词都是自相矛盾的;其理由是:既然经济学研究的是物质福利的原因,而战争不是物质福利的原因,所以战争也就不会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11][12]}

最后,需要指出,尽管边际革命之后,新观点经济学就把对实物(价值)的研究转向了对货币关系的研究,并在供求曲线的基础上建立了“均衡价格”学说,但对货币关系的真正研究是在凯恩斯建立宏观经济学之后。事实上,从19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初这大约100年期间,经济危机虽然没有中断过,却也都比较温和、短暂;相应地,尽管此时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已经着重分析货币关系,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萨伊定律”,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不会发生普遍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显然,这成为当时西方经济学的主导思潮,马歇尔、庇古等都默认了萨伊定律。当然,萨伊定律本身内在了明显的缺陷,这包括:忽视商品和物物交换的区别,不变的现金余额,储蓄和投资相等,没有货币幻觉,忽视经济体制的不确定性以及真实余额效应。但是,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经济危机的总爆发,凯恩斯才开始向以萨伊定律为基础的自由放任政策发出挑战,并进而对古典经济学基础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同时期的帕廷金也把萨伊定律与他对于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逻辑充分性的批评联系起来。为此,凯恩斯习惯于把所有在他之前的经济学说都称为古典经济学,因为它们都是建立在萨伊定律基础之上,并没有对货币展开真正的分析。

四、关注社会需要效用阶段

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把“经济的”等同于物质的,把追求财富或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看作经济行为的

本质,主要与其劳动价值理论密切相关。根据这种理论,人们之间的交换行动与个人没有进入社会范围而只是在自己家里的行动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商人的特殊行为也仅仅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或者财富的最大化,孤立的农民的生产行为也是如此。但是,一旦边际主义者把价值理论转向了主观价值论,那么,这种区分就开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不一致了。究其原因,如今被归属于“物质”的东西不仅可以与同类的其他“物质”相交换,而且也可以与荣誉、名望和赏识等“非物质”相交换,甚至物质交换的行动也被交易的一方或双方仅仅视为达到“非物质”满足的手段。相应地,主观价值论者也开始强调,传统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之间的划分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涉及物质产品与非物质产品交换的行动与只涉及物质产品交换的行动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相应地,财富的内涵也被边际主义学者置于主观效用之上。米塞斯就指出了边际主义的两大基本命题:(1)经济原则不再仅仅表现为某些理性行动的特征,而是所有理性行动的基本原则,因而所有理性行动都是一种经济化的行动;(2)任何有意识的或有意义的行动都是理性的,而只有行动所要求达到的最终目标(价值或目的)是而且确实总是毫无例外地必定超出理性的,因而那些考虑到荣誉、虔诚或政治目标之类价值的行动也就不能被称为“非理性的。”^{[12]146}

事实上,尽管新兴的新古典经济学承袭了李嘉图、西尼尔、穆勒、凯尔恩斯以及内维尔·凯恩斯的方法论而将经济学视为一门抽象的演绎科学,并赞成穆勒等对经济科学的一般意义上的解释,但是,局限于物质财富的传统做法却逐渐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以致财富的内涵和外延也就逐渐被拓广。例如,罗宾斯不仅否定将经济学视为关于财富的科学的穆勒定义,也不同意将经济学视为有关物质福利的科学的马歇尔定义。其理由是:许多是“物质的”东西并不是“经济的”,如一堆无价值的石头;另一些是“经济”的东西也不是“物质的”,如劳动服务。罗宾斯就提出,“既然歌剧舞蹈者的劳务是财富,经济学就不仅要研究厨师劳务的定价问题,而且还要研究歌剧舞蹈者劳务的定价问题。不管经济学研究的是什么,反正研究的不是物质福利本身的原因。”^{[11]14}在罗宾斯看来,经济学的真正核心并非物质主义,而是配置。为此,他将经济学定义为:一门“把人类行为当做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11]20}这一定义为后来的经济学者广泛接受,他们根据这一标准来改进其方法论并从事经济研究。而且,这种分析不仅与传统的“物质财富”相割裂,也与市场或资本主义相割裂;同时,它引入了对人际效用的探讨,从而促进了对人类福祉的重新关注,并将福利经济学引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当然,由于二战严重破坏了人类社会所积累的物质资本,经济重建就成为战后世界各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在这种情势下,物质需求的满足重新成为人类社会的关注重点,相应地,如何有效配置那些有限的物质资源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也就成为时下经济学的重要议题。显然,对既定而有限的物质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最大化地促进经济增长,这基本上是一个工程学范畴,因而自然科学领域中新发展的技术就受到了青睐和应用;相应地,这不仅导致战后经济计划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盛行,而且也数量经济学的出现和膨胀奠定了社会基础。然而,尽管通过合理计划,在牺牲或延期人们消费的情况下,物质财富取得了高速增长,但这种情况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却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滞胀危机。此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又遭遇到了信任危机,因为当时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滞胀危机正是国家干预和理性计划的结果。相应地,以货币主义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以及供给学派为主体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开始兴起了,该学派强调宏观经济学中也存在理性预期,并重新把“萨伊定律”奉为理论的主臬,反对国家干预而崇尚自由放任。正是基于极端的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新古典宏观派的经济学家热衷于运用大量高深的数学和计量经济学建立复杂的模型,重新构建一般均衡模型。这种数理取向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并导致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形式化,经济学理论也越来越脱离现实。

事实上,当时的关键问题是,以前的国家干预并没有引发滞胀的出现,但为什么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会出现呢?显然,现代主流经济学并没有给出稍有说服力的回答。主流的观点是把理性预期转化为适应

性预期理论,把人类理性视为棘轮发展的。根据这种适应性预期学说,主流经济学想当然地以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百姓已经完全了解了政府的手段及其后果,因而政府已经完全不能推出货币政策来蒙骗社会大众。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经过近30年的时间百姓才了解政府的政策呢?显然,现代经济学文献没有提供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因而这种基于理性变迁的解释逻辑是有问题的。事实上,其中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在这短短的30年内人类理性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是人类社会所依赖的主要生产要素以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致那种处理资源配置的传统思维已经不再适用新的形势。^[13]其实,基于数量的理性计划对自然资源的配置是可行的,因为基于数量的工具理性本身就源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它对那些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资源却往往无能为力。而问题恰恰在于,经过30年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发达国家的物质资本已经相对饱和,而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资源开始转向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也是人力资本的概念会在这个时期被提出的原因。

显然,人力资本不像物质资本那样可以被任意摆布,它涉及到不同人力资本主体之间的互动,考虑的不是个体理性而是互动理性。同时,人力资本能否发挥出应有的效力关键在于其主动性,而主动性的发挥不能靠控制或监督,而是靠激励。正因如此,自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70年代以来,基于工具理性之联合的博弈论和激励理论就开始勃兴了,经济学科的定义也从一门“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的学科转变为变成了“一门有关理性的人如何行为”的学科。同时,由于人类行为的相通性以及社会现象的相互联系,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就开始向其他领域进行扩张,从而就出现了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这也就进入了贝克尔所讲的经济学第三阶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主流经济学对人类的互动理性和激励理论的探究也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因为它根本上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研究思维,把人与物之间的逻辑理性应用到人与人的互动上,这就形成了当前的单向激励的委托-代理理论以及非合作的纳什博弈理论,结果都是陷入囚徒困境。更为糟糕的是,尽管财富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包括人类的消费财富从物质转向了非物质领域,以及生产财富从物质资本转向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但是,由于主流经济学的抽象思维方法没有变化,经济学基本范式反而更为僵化。正是因为研究方法没有伴随研究对象进行调整,结果必然导致了经济学解释力的下降,这是当前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五、结 语

从思想史的大视角看,经济学的性质经历了人本——物本——人本的否定之否定发展轨迹:早期经济学是关于人的“科学”,具有强烈的人文性;边际革命之后逐渐演变成“见物不见人”的科学,以致退化为一门计算技术;20世纪80年代后重新向人本主义复归,重新注重社会学科之间的交叉和契合。这种性质演化也与人们对财富的内涵和外延之理解有关,因为经济学狭义上可以被看成是研究财富的学问。正如内维尔·凯恩斯所说,“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中,经济一词一般简单地被用作实际财富这个形容词的对应语。例如,说到一个经济事实,总是一个与财富现象有关的事实。说到经济活动,总是意味着人类直接进行财富创造、分配和积累的活动;我说到经济习俗和制度,也是人类社会关于财富的习俗和制度。”^[14]不过,财富的内涵和外延却与特定时代的人们需求状况密切相关,从而也产生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更。一般地,人类所追求的首先是生理需求,与此相对应的就是物质财富,因而早期的财富概念主要局限在物质生产领域。当然,古典经济学之所以日益偏重物质财富的研究,根本上是受了斯密对财富所下定义的影响。斯密从商品的物质观出发,将生产性劳动定义为可以储存起来并在必要时可再提出来使用的劳动,斯密的这种观点为马尔萨斯、穆勒等继承并影响了以后几十年经济学的发展。但是,随着人类需求层次的上升和需求对象的扩展,后来的古典经济学者就对财富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持续的扩展,这包括马尔萨斯、西尼尔、萨伊、穆勒等。到了新古典主义时期,由于主观性的效用概念已经取代了客观性的价值概念,主流经济学者便进一步否定了从产品的物质性角度来

定义劳动生产性的做法。例如,坎南在《生产与分配理论》一书中认为,只要歌剧演唱家和舞蹈者的劳动是需求对象,就应该把这种劳动视为“生产性的”。同样,费雪甚至认为,得自物质对象的收入,最终肯定表现为“非物质的”用途,这些实际上都体现了生产性劳动和商品外延的拓展。^{[15]107-116}

从另一个角度说,经济学关注的是经济现象及其内在规律,但是,人们对“经济”一词的界定本身就是不固定的,这种界定的变化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更。韦伯就指出这样两点:“一方面,‘经济’现象的范围是一个易变的、无法清晰界定的范围;另一方面,一个现象的‘经济’方面当然决不仅仅是‘受经济制约的’或者仅仅是‘起经济作用的’;一个现象只是就我们的兴趣专注于它对于为生存而进行的物质斗争所具有的意义而言,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获得了一个‘经济’现象的性质。”^{[16]2}其实,大凡经济学的突破和发展都与对“经济”一词的理解有关。例如,早在古典主义时期,约翰·穆勒就批判了那种过分注重财富生产的做法。在穆勒看来,增加生产只有在落后地区才是重要的目的,而在进步国家则更需要较好的分配制度。也就是说,决定一个社会福利状况的不仅是物质财富的数量。事实上,遵循穆勒和马歇尔传统的旧福利经济学就致力于比较收入分配变化的福利应用,加尔布雷斯的《丰裕社会》作了进一步发展。同样,随着“效用”和“偏好”的引入进一步扩大了“经济”的外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日益渗透到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以致开始出现了一个经济学帝国。正因如此,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人类需求的转变以及对社会认知的加深,经济学所关注的人类需求之外延也正日益拓宽,经济学所研究的领域也越来越广,以致经济学科本身也处于一个不断发展的态势之中。同时,研究内容的变化必然带来研究思维的转变,也即,当前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变化对其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重新回到早期注重学科交叉的研究思维之路。然而,尽管现代经济学帝国主义运动在研究对象上再次形成了学科交叉,但这种学科的交叉与以前存在很大的不同:它不再是古典时期乃至更早之前的相互融合,而是经济学的单方面运动,是自然主义理性的盲目扩张。因此,基于当前的主流研究范式的政策必然会造成社会中新的失范现象,也必然会造成理论上的困境。

参考文献:

- [1]朱富强. 经济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及其实现途径:主流经济学的演化和反思[J]. 改革与战略,2009(7):15-27.
- [2]朱富强. 经济学研究的两大基本内容及其对知识结构的要求:对日益狭隘化的现代主流经济学之反思[J]. 当代财经,2009(7):21-30.
- [3]贝克尔.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 王业宇,译.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 [4]斯威德伯格. 经济学与社会学[M]. 安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5]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6]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第1卷)[M]. 朱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7]色诺芬. 经济论[M]. 张伯健,陆大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8]普特南.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M]. 应奇,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 [9]熊彼特. 经济分析史(第2卷)[M]. 朱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 [10]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上卷)[M]. 朱志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11]罗宾斯. 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 朱泱,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12]米塞斯. 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M]. 梁小民,译.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 [13]朱富强. 新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J]. 改革与战略,2009(6):8-16.
- [14]J. 内维尔·凯恩斯. 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M]. 党国英,刘惠,译. 北京:华夏人民出版社,2001.
- [15]朱富强. 有效劳动价值论:以协调洞悉劳动配置[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 [16]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M]. 李秋零,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